

# 后殖民语境下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及其翻译行为

刘彦仕

(四川文理学院外语系 四川 达州 635000)

【内容摘要】以权力差异为先导的后殖民语境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无论在文化价值观、诗学规范,还是读者意识等问题上都会体现出一定的主观意识,表现其个人或社会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的关系实质上是译者在两种语言的诗学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上加以抉择的体现。选择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为个案分析,从后殖民视角分析他在译介实践中的翻译行为,探究文化身份有利于深化对译者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和翻译意图等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后殖民语境 译者 辜鸿铭 文化身份 翻译行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10-0172-04

## 一、引言

文化身份这一概念于20世纪末由加拿大华裔社会学家张裕禾引入中国语境,是后殖民语境中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词。“文化身份是一个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在与其他人、他群体、他民族比较之下所认识到的自我形象;文化身份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sup>[1](P73)</sup>它属于过去,也属于将来,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文化身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建构性,是个常变常新的延续体。文化身份的动态变化更能体现拥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所寻求的自我认同。<sup>[2]</sup>文化身份是一个文化上的归属问题,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身份往往引起文化焦虑和认同危机。

在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身份问题伴随着译者的主体性问题进入学者的接受视野。以权力差异为先导的后殖民语境理论,借助描写法研究和解释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的关系实质上是译者在两种语言的诗学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上加以抉择的体现。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选择取决于语言之外的政治、经济、宗教、意识形态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其特点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为个案,从后殖民视角分析他在译介实践中的翻译行为,探究文化身份有利于深化对译者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和翻译意图等问题的认识。

## 二、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

后殖民理论始于20世纪40至60年代,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关心文化地位的差异以及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从后殖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研究隐藏在翻译活动背后的两种文化之

间的权力斗争,关注译本生成的外部因素和权力关系,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因为存在着权力差异,从未有过真正平等的对话。

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从归化和陌生化的翻译策略切入后殖民翻译研究,通过研究西方翻译史,批评了英美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源语文本通常采用的“归化”策略。他发现在英美文化中外国文学的译入通常采取的是归化策略,即采用通顺、流畅、自然的英语进行翻译,依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文学的规范调整译文,对原文进行增减、改写,使翻译文本符合译语读者的喜好和偏见。归化翻译建构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成了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和强化殖民意识形态的共谋,即是说,它不仅帮助殖民者散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略,而且在被殖民一方的意识中不断强化他们自我身份的认同。<sup>[3]</sup>因此,韦努蒂主张以异化策略对抗占主流地位的归化翻译。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使弱势文化和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的语言和文化形式得以在强势文化中彰显,译者应采取抵抗式的翻译策略,采用异化翻译方法。异化法是指译者为了故意对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进行冲击而保留原作一些差异性特征的翻译策略。

而另一位后殖民翻译理论学者罗宾逊认为:当异化论派攻击归化翻译时,他们实际是在谈论霸权文化对受制文化的翻译。如果是受制文化用归化方法翻译殖民文化的文本,则应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反应。异化翻译有时比归化翻译更“殖民化”,异化的译文会使原文作者和源语文化看起来幼稚、落后、原始,所引起的效果恰恰是异化论者所反对的。萨义德明确指出,殖民主义主要特征是制造东西方的本质差异,将东方书写成神秘、落后、野蛮、愚昧的他者,急需西方的开化与拯救。<sup>[4]</sup>因此,不能简单说,所有的归化翻译对译

\* 作者简介:刘彦仕,男,四川文理学院外语系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

语读者会造成消极影响,而所有的异化翻译会产生积极影响。其实,归化翻译同样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用于弱势民族影响目标语主流意识形态,以重塑本土的民族文化身份。辜鸿铭在典籍翻译活动中所采取的归化法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 三、译者主体性下的文化身份

纵观中外翻译研究历史,译者的主体地位经历了一个由遮蔽到彰显的演变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突破了纯语言研究的重围,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者的文化身份和主体地位得以彰显。这些翻译研究从译者的主体性和目的文化的角度着手,“注重翻译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以及‘语境、历史和传统作用下的更大一些的问题’”<sup>[5](P178)</sup>。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也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解释学以及随后的接受理论进一步彰显了读者(译者)对文本意义建构的积极作用,同时女权主义学派、诠释学派也从多元化视角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声援,并支持他的“合法身份”。

国内多位学者如方梦之、屠国元等对译者主体性的内涵作过讨论研究。“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sup>[6](P21)</sup>仲伟合梳理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指出,“译者主体性是在尊重客观翻译环境的前提下,在充分认识和理解译入语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它体现了译者……自觉的文化意识,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受动性等特点。”<sup>[7](P43)</sup>可见,译者要完成翻译任务,在翻译活动全过程中就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张扬译者的独特个性。

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译者在翻译文本中是不可能隐形的,有时甚至会主动站出来与目的语读者进行交流。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也是译者主体性的一种表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无论在文化价值观、诗学规范,还是读者意识等问题上都会体现出自己的主观意识。译者根据自身理解和思想倾向,对原作进行选择、取舍和创造,向译语文化传播源语文化。“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以生命,他们还能决定赋予他们以何种生命,以及如何使他们融入译语文学中。”<sup>[8](P47)</sup>译语文化多元系统中制约翻译的种种因素往往都聚集到译者的身上,由译者作出文化或审美的判断和抉择。正因如此,译文不是原作的简单翻版,而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一种体现。可以说翻译是以译者为主体的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行为。

### 四、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

由于文化和翻译的复杂性,译者文化身份的界定也是非常复杂的,需从多层次、多角度来探讨和分析。简单说,译者文化身份是“以民族性为立足点的文化中介者”。在坚持民族文化身份的本土性的同时,要避免文化趋同,尊重他

者文化,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维护文化多元性和异质性,通过翻译使自己不落入“失语症”,在平等对话中坚持后殖民语境弱势文化的话语权。

“辜鸿铭的翻译却永远站得住,因为它们来自对两种文字的精通,以及对于它们较深奥意义的了解,是意义与表达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sup>[9](P61)</sup>这种熟练不仅限于文字,而且还包括文字背后的文化。我们应该看到西方文化对辜氏一生深刻的影响。辜鸿铭的文化活动多被世人认为带有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色彩,其实,辜鸿铭在汉文化情结的驱使下,潜意识里在宣扬中西文化融合论,是一位由“中国文化救西论”走向“中西文化融合论”的思想者。他强调对西方物质文明做出选择并进行超越,真正整合东方和西方的长处。他洞察西方社会文化的弊端,通过宣扬东方社会的儒家观念来拯救西方的文化意图,提出“撻西扬中”的文化观,来寻求中西文化融合的终极文化理想。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认为,一个受多种文化语境影响的人身上往往出现文化的杂糅。所谓杂糅,是指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作为翻译个体的辜鸿铭是处在中西文化的交汇部分,体现在中西“交互文化”的纠缠之中。一方面,他所接受的是正统的西方教育;另一方面,又为中国文明所倾倒。他唾弃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不忍看到几千年的中国智慧由于这些弊端而走到末路;他赞扬的是中西方文明的精华部分。译者辜鸿铭正是处在这种“交互文化”之中,来处理典籍翻译,因而在翻译策略上亦充分体现了这种特征。

由于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在处理产生于东方这个“他者”文本时,译者的文化身份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对源语文化的态度和理解、采用的翻译策略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这些由译者自身的内在动因与社会意识形态、时代诗学、出版赞助等外在的动因相呼应,对他们的译作在译入语国家的接受产生巨大作用。辜鸿铭的双重文化身份对其性格的塑造、价值观的形成和职业选择都有很大的影响。译介中国文化和文学经典的实践,表明其文化身份的建构,时代诗学对他个人文学观和翻译观的影响,折射出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及中国文化对其个人意识形态和人格的反作用。

辜鸿铭生于一个东西联合的家庭,其一生可概括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sup>[10](P362)</sup>。他先接受了正规系统的西方教育。之后,因饱受欧洲人的白眼,他决心要向洋人证明中国的强大,转向钻研中国文化典籍,穷其毕生精力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他将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大学》等英译以传播中国文化与精神。他的翻译输出,名震西洋,是“造就精通译语译文,兼容华文,而造其堂奥”的译才典范,被称为“专办出口货的”,与严复、林纾并称“译坛三杰”。林语堂认为,他的译作“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sup>[11]</sup>。所以说,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为世人认同。

### 五、辜鸿铭的翻译行为

辜鸿铭被称为我国近代翻译的先驱。他除了译介英国



诗歌外,还独立地把《论语》和《中庸》等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为把国学播向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辜鸿铭的翻译活动并不是在其回国后就立即开始的。早在19世纪80年代末,辜鸿铭结识的一些传教士曾鼓励他去翻译儒家经典著作,直到1898年,他才翻译出版了第一本译著《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该书在当时的欧洲销量将近百万册。1906年,他的第二本英译著作《中庸》在上海出版了,林语堂对《中庸》译文推崇备至,在其编译《孔子的智慧》一书中完全采用了辜鸿铭的《中庸》译文。此外,辜鸿铭还翻译了《大学》,曾将英译《大学》赠送给俄国文豪托尔斯泰。辜鸿铭对中国的真正的贡献,在于其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外宣传国学,使国学走向世界方面。

在英译《中庸》序中辜鸿铭明确提到其翻译标准:“彻底掌握其中意义,不仅对等译出原作的文字,而且再现原作的文体风格”。<sup>[9]</sup>由此可见,辜氏翻译上坚持忠实原文的原则,将风格与内容相融一体。辜氏翻译中注重原作内容,主要是指对原作精神的把握。他屡次强调风格形式的重要性。这样看来,力求能够再现内容和形式,译者应该首先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在翻译儒家经典上,尤其主要体现在对其精神内涵的把握,其次是形式。辜鸿铭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向西方介绍新思想的作用,但在翻译上他采用的策略并没有保留“传统形式”,即源语的形式。所有翻译都是针对特定的对象,因为翻译意味着在译语背景下,为了满足译语目的,符合译语读者,在译语的场景中创造文本。

在翻译中,译者作为着文化中中介调和者,其文化身份往往使之充当文化警察的角色,起着调和两种文化的作用,寻找源语和译语文化的共同利益,实现译语与源语及文化的妥协与合作。这里的“利益”,并不只指向经济利益,还指向美学、哲学、道德等价值观的互融共生。具体地说,译者能敏锐地察觉原作中可能存在的文化冲突,对这些文化信息采取合理的淡化改写等适应手段。辜鸿铭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就是对中西文化的一种调和策略。

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翻译方法无疑是翻译动机和翻译目的驱使的。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瓜分蚕食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举国上下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潮流。此时,辜鸿铭却致力于国学经典的英译活动,究其动机,不难发现他是将翻译视为抵抗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手段,借助翻译将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向自视清高的西方人展示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精髓,以消除对中华民族文化“他者”形象的歧视。也就是说,他在西方强势文化中坚守民族文化身份阵地,喊出了本民族的声音。辜鸿铭翻译服务的对象是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在《论语》译序中,他表示:“想借此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即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sup>[10]</sup>在《中庸》的译序中,他希望他的译书能使欧美人在对待中国及其人民时,能够抛弃欧洲那种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代之以道,那么他将感到多年理解和翻译此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

辜鸿铭经典英译文本是应对不对称文化交流的产物,

而导致此翻译行为的直接原因却是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原义且充斥异质性的译本。早在16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就已开始陆续由一些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他们基本上采用直译的方法,并辅以大量的注释或诠释。由于过于紧贴原文形式,这些译本显得刻板僵硬,颇多佶屈聱牙之处。辜鸿铭清楚地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绝大部分西方读者对真正的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缺少对源语文化的了解,必定会使西方读者难于接受充满太多异国情调和异质性的译文。这些译本,不仅难以被西方普通读者所理解,反而会歪曲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达不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然而,要成功地让西方霸权国家理解乃至认同中国文化,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无疑至关重要。西方人自视清高,大肆制造、散播东方主义的言论,将中国描述成愚昧、落后、野蛮、守旧的帝国,为西方的殖民扩张、输出文明制造口实。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辜鸿铭采用归化法将儒家经典译介到西方,虽不可否认有“强势语下的无奈”因素,但更应视为其对本民族文化形象的积极捍卫之举。国学经典承载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以基督教文化传统为主流的西方读者来说,其异质成分可想而知。为了避免西方读者因其异质性而将中国文化拒于千里之外,归化法是其最佳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归化翻译可以使中国优秀文化儒学经典不以古怪、难懂的面目出现在译语读者的视野中。在殖民主义者手中,差异常常变成政治,特色往往被“东方主义”化并使之成为歧视中国的理由。<sup>[12]</sup>他的目的在于彰显中国儒学的普遍价值,宣扬儒家思想是跨越东西方地域的普遍真理,而不是在于突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通过归化,辜鸿铭在译文中让儒学与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学说接轨,为中国文明树立了正面的形象,赢得了西方读者的广泛理解与同情,其译本也因此而在西方得以畅销流传。

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过程中所持的文化目的必然在译者对待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态度中反映出来,并渗入译者的整个翻译策略,最终必然在译作中有所体现。译者的文化态度通常都是其文化目的的必然体现,二者之间则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和同一性。<sup>[13]</sup>辜鸿铭的儒经翻译,打破了由传教士、汉学家垄断中学西渐、制造中国形象的不利局面,夺回了代表中国发言的话语权。他的翻译具有反对殖民主义,尤其是文化殖民的初衷与色彩。他利用术语翻译凸现中国文明的道德诉求。在前言、注释和附录中,广泛征引西方文学、哲学、宗教中的同道者言,印证儒家文化与西方道德文化的共通性,争取最大的理解与同情。他抓住机会,甚至通过创造性诠释制造机会,针砭西方物质文明、民主制度和庸俗进化论的弊端,大力宣扬儒家道德文化的功能。辜鸿铭的英译成功与其文化身份立场、翻译策略的选择密不可分。

总而言之,从后殖民语境视角研究辜鸿铭译者文化身份及翻译行为发现,译者的文化身份定位主要取决于译者个体的主观文化立场,决定着译作是否真正能尽量真实再现源语文化。译者会在文本层面主、客观操控其忠实度和交际方式,更在副文本(内容提要、序跋、注释、附录等)中有现身说法的空间,目的是协助读者更加深刻理解原作,了解真

实的他者世界。归化、流畅、求同的翻译并不总是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或者我族中心主义的表现。异化、阻抗、存差异的文本也不一定总是反殖民的翻译,它也很可能沦为殖民主义者制造“他者”形象,玩弄差异政治的手段。我们对翻译方法做出伦理、政治的判断,必须因人、因时、因地做出必要的分疏,切忌简单化的一刀切。

参考文献:

- [1]张裕禾,钱林森.关于文化身份的对话[A].乐黛云主编.跨文化对话9[C].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 [2]刘彦仕.译者文化身份的杂糅性[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8(1):78-82.
- [3]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J].中国翻译,2002(5):32-35.
- [4]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9.
- [5]Monday, 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

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6]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19-24.
- [7]仲伟合,周静.译者的极限与底线[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41-43.
- [8]Lefevre, Andre & Susan Bassnet.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9]辜鸿铭.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9.
- [10]严光辉.辜鸿铭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 [11]林语堂.林语堂作品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 [12]钟明国.辜鸿铭《论语》翻译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及其对翻译目的的消解[J].外国语文,2009(2):135-139.
- [13]孙广治.文化间性视域中的杂合翻译策略[J].外语学刊,2008(5):97-99.

(上接第169页)并且教材难度要适应学生的英语水平,学生要求教师创造英语交际的机会和环境,语法翻译教学法不能满足学生的交际需求;学生要求教师课堂授课语言以英语为主,学生希望教师既要具备较强的英语水平,又要具备丰厚的专业基础知识。

综上,在以后的商务英语教学中,教师要继续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态度和动机,教师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教材,并且要开发更多的辅助性学习资料,教师要改进教学方法,创设英语氛围,让学生主动参与有意义的学习之中,既要帮助学生学习到基本的商务英语知识,又要帮助他们将所学的

知识灵活运用于模拟或者真实的专业实践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教师要不断加强业务水平的提升,一要提高教学理论水平,二要提高英语水平,三要提高专业知识水平,从而满足学生的需求。总之,商务英语教学要以人为本,从社会需求出发,以应用为主旨构建商务英语课程和内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及商务知识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 [1]张德禄.功能语言学语言教学研究成果概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19-22.
- [2]邹德虎.高职院校ESP教学情况调查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